

中国地域文化丛书

吴越文化



张
宁教

中国地域文化丛书

吴越文化

张 荷 著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一九九八年·沈阳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吴越文化/张荷著. - 沈阳: 辽宁教育出版社,
1995.4 (1998.6 重印) (中国地域文化丛书)
ISBN 7-5382-1436-4

I. 吴… II. 张… III. 文化-中国-华东地区
IV. G12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4) 第 15496 号

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沈阳七二二工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: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字数: 206 千字 印张: 9 1/4 插页: 7

印数: 9 001—12 000 册

1998 年 6 月第 2 版

1998 年 6 月第 3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王越男 谭 坚 封面设计: 郑在勇

赵中男

责任校对: 刘 璪

美术编辑: 谭成荫

版式设计: 赵怡轩

定价: 14.00 元

《中国地域文化丛书》序

李 侃

近几年来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讨论和历史评估，成为学术界理论界的一个热门课题。文化史研究的兴起，是与现实社会生活有着密切关系的，因为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，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，就不能脱离中国的国情民情，而国情与民情又都与历史传统有割不断的联系。马克思说：“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，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，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，而是在直接碰到的、既定的、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”（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1卷，第603页）。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，但是它又不可能抛开历史文化遗产，完全从头开始。因此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，就成了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历史任务。对传统文化不分精华和糟粕，“兼收并蓄”、“全盘继承”，当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，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。与此相反，对传统文化，采取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，一概否定，一概排斥，如果不是思想的幼稚，就是另有用意，而且

同样是办不到的。至于在关于传统文化的讨论中，发生这样那样不同意见的分歧和争论，这就不但是正常的，而且是有益的。对于如此悠久而复杂丰富的传统文化，不要说不可能轻易地做出什么“结论”，就是理出一个比较清晰的头绪来，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。

前一个时期关于传统文化的研究和讨论，大多是偏重于宏观的论述，或者就某一个学派（如儒学）、某一种宗教（如佛教和道教）以及某个时代的社会思潮和某些人物的思想等进行研究，这当然也是很必要的。然而中国不但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，而且又是地域辽阔的多民族统一的大国。不但社会经济的发展很不平衡，文化的发展也很不平衡，而经济和文化的形成和发展，又都具有明显的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，这种各具地区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文化互相交流和互相融合，就构成了绚丽多彩、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。对这些地方文化，进行历史地、具体地考察和研究，从地区文化的特殊性中找出中华文化的同一性，这不仅对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祖国历史文化遗产有重要的意义，而且对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，也有很重要的意义。

近些年来，随着历史文物的不断发现和整理，随着研究视野的开展和研究领域的拓宽，为地区文化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。值得高兴的是，辽宁教育出版社组织出版了这套《中国地域文化丛书》，“丛书”将包括齐鲁文化、三晋文化、吴越文化、巴蜀文化、台湾文化、西域文化、徽州文化、荆楚文化、燕赵文化、三秦文化、关东文化、岭南文化等等，构成了锦绣中华的历史画卷。读者可以通过这套丛书，更全面更具体地了解到中华民族各族人民，在我们这块古老的土地上，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，是怎样在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不同

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用自己的劳动智慧创造了自己的文化，形成了至今犹存的独特的社会文化生活风貌。

一定的文化，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，同时又对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起着巨大的作用。长期积累起来的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精髓，铸成了中华民族的灵魂，凝聚着奋发向上、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。尽管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，文化也会不断地发展和更新，然而优秀的传统文化却不但不会消失，而且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。水有源、木有本，文化也有根；只有源远流才能流长，本固才能枝荣，根深才能叶茂。没有根或断了根的文化，也如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，是不免于枯萎的。在文化上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，不但有悖于炎黄子孙的民族良知，也有悖于历史的科学精神。因为这种数典忘祖的虚无主义，只能导致民族精神的涣散和对西方的盲目崇拜。因此，出版这套“丛书”的一个重大意义，还在于通过对祖国各地区历史文化的了解，增强人们对伟大祖国的热爱。虽然不同历史时期的爱国主义，具有不同的时代内容，但是热爱祖国的优秀文化，发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，则是任何时代都不可缺少的。而当今之世，在国际风云急剧变幻，各种社会思潮此伏彼起，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情况下，让更多的人加深对祖国优秀文化的了解，从而增强民族的自尊、自信和自强心，则尤为重要。

对古代地区文化的探讨和研究，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，这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和付出艰苦的劳动，何况万事开头难。我赞赏《中国地域文化丛书》的作者们勇敢的开拓精神，和他们在传统文化研究中所做的有益尝试。也赞赏辽宁教育出版社的远见和气魄，热心祖国的文化学术事业，精心

组织、大力支持《中国地域文化丛书》的出版。像任何新的事物一样，对古代地区文化的研究在开始的时候，也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和缺陷。但世界上哪里会有一开始就十全十美的事物呢！

我自己，有感于作者们勇于探索、刻苦钻研的精神，和出版者勇于开拓、努力创新的精神，在这里说一点粗浅的感想。衷心祝愿作者们在坎坷的科学道路上，继续奋进，勇敢攀登。

1990年7月25日

编者札记

我们一直在探讨“文化”。

尤其是近些年，在“交叉科学”的旗帜下，与文化“联姻”的学科纷纷涌现：文化人类学、文化生态学、文化经济学、文化地理学等等。形式的媾和不排除牵强的因素，但其主体却反映了时代学术的趋向。它既承认传统学科存在的合理性，又拓宽和丰富了人类的认识视野，为文化学研究带来一片生机。《中国地域文化丛书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。

地域文化 (Regional Culture) 或称“区域文化”，是一门研究人类文化空间组合的地理人文学科，在某种意义上大不同于文化地理学 (Geoculturelism)。它们都是以广义的文化领域作为研究对象，探讨附加在自然景观之上的人类活动形态，文化区域的地理特征，环境与文化的关系，文化传播的路线和走向以及人类的行为系统，包括民俗传统、经济体系、宗教信仰、文学艺术、社会组织等等。但在某些方面，地域文化又与文化地理学有着明显的区别。一般说来，文化地理学是以“地理学”为中心展开文化探讨的，其中的“地区” (District) 概念具有极强的地理学意义，它疆域明确，系统稳定，与现实的“地区”是吻合的。而地域文化是以“历史地

理学”为中心展开的文化探讨，其“地域”（Region）概念通常是古代沿袭或俗成的历史区域，它在产生之初当然是精确的，但由于漫长的历史逐渐泯灭了它们的地理学意义，变得疆域模糊，景物易貌，人丁迁移，只剩下大致的所在地区了。如“齐鲁”概指山东，“关东”泛指东北等，在这里“地域”与“地区”的概念是有区别的，这是地域文化与文化地理学的“小异”之处。

岁月的流逝虽然改变了古代区域的精确性，但这种模糊的“地域”观念已经转化为对文化界分的标志，深深地积淀在人们的头脑之中，并且产生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。显然我们不应忽视或轻视这个文化范畴的存在。

古人已发现：不同地区的民俗传统是有差异的，这种差异通过各自的行为系统表现出来。《礼记·王制》中记载了“王使太师陈诗以观民风”的做法，就是要通过诗歌体察各地的民情。《诗经·国风》按照十五个地区汇集诗歌，生动地表现出各个文化区域的风土人情，是将文化按地域类分的先声。《左传·襄公二十九年》记叙了吴公子季札观乐于鲁的故事：

“……为之歌邶、鄘、卫，曰：‘美哉，渊乎！忧而不困者也。吾闻卫康叔、武公之德如是，是其卫风乎？’……为之歌齐，曰：‘美哉，泱泱乎，大风也哉！表东海者，其太公乎！国未可量也’……为之歌唐，曰：‘思深哉！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？不然，何忧之远也。非令德之后，谁能若是！’……”

从这段记载中我们看到，季札观乐，能够准确地领悟各首乐曲表现的“国风”，他对音乐的精通固然令人敬佩，而诗乐中

蕴含的“地域特征”也确实足鲜明可鉴的。

《汉书·地理志》中已明确地提出了“域分”（即按不同的历史区域划分民俗民风）的概念：

“凡民函五常之性，而其刚柔缓急，音声不同，系水土之风气，……好恶取舍，动静之常，随君上之情欲。”

把人的行为和观念归因于两个因素，即水土的构成和王侯的引导。这个观点是很有价值的，就现实而言，地域文化的形成也不外乎两种主要因素，一个是自然环境，一个是社会结构。

首先说到自然环境。我国地域辽阔，气候复杂，大体可划为三个自然区，横跨六个温度带，地理属性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。古人早已注意到了水土风候对民俗文化的影响，并多有论述，仅举数例：

“邹人东近沂泗，多质实；南近滕鱼，多豪侠；西近济宁，多浮华；北近滋曲，多俭嗇”（《邹县志》）。

“平原故址，其地无高山危峦，其野少荆棘丛杂，马颊高津，经流直下，无委蛇旁分之势，故其人情亦平坦质实，机智不生。北近燕而不善悲歌；南近齐而不善夸诈，民醇俗茂，悃悞无华”（《陵县志·序》）。

“潇湘间无土山，无浊水，民乘是气，往往清慧而文”（刘禹锡《送周鲁儒序》）。

“吾郡少平原旷野，依山而居，商贾东西行营于外，以就口食。然生民得山之气，质重矜气节，虽为贾者，咸近士风”（《戴震文集》卷十二）。

“浙东多山，故刚劲而邻于亢；浙西近泽，故文秀而失之靡”（旧《浙江通志》）。

从这里我们已经清楚地感受到自然环境对人类行为的决定性作用，当然这仅是一个侧面。明人钱澄之在《记黄檗山居》一文中谈到吴地之人曾笑话他的家乡（桐城龙眠山）园亭简陋，他反诘道：“吾乡有真山水，何以假为？唯任真，故失诸陋，洵不若吴人之工于作伪耳。”山水奇秀之地，当然无须“工于作伪”，而吴人的巧于凿池叠山大概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吧。看来自然环境不但影响一地的风俗人情，更影响着文化艺术、宗教信仰甚至民居建筑，它对于一个地域文化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是全方位的。

其次说到社会结构。华夏文明史跨越了几千年的沧桑岁月，历史变迁对地域文化的影响无疑也是巨大的。仅以“吴越”为例，春秋之际，吴越两国连年征战，尚武习俗蔚然成风。史载：“吴越之君尚勇，故其民好用剑”（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）。“士有陷坚之锐，俗有节慨之风”（左思《吴都赋》）。但晋永嘉之后，吴越的民风却发生了转变。“永嘉以后，衣冠避难，多萃江左，文艺儒术，于今为盛，盖因颜谢徐庾之风焉”（明刘槃《成化记》）。“其民老死不识兵革，四时嬉游，歌鼓之声相闻”（苏轼《表忠观碑记》）。在这个从“尚勇”到“崇文”的社会风气的转变过程中，虽然未必绝对，但晋“永嘉之乱”后文人的大量南迁避祸，无疑是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。再如：

“蕲春人性躁劲，风气果决，包藏祸害，视死如归，战而贵诈，此则其旧风也。自平陈之后，其俗颇变，尚淳质，好俭约，丧纪婚姻，率渐于礼”（《隋书·地理志》）。

可见“平陈”对蕲春风俗变更的作用也是明显的。当然，历史的作用不仅限于对传统的改变，更在于对传统的保守和延续。徽州地区宗法制度的保持与传承就是明显的例证：

“新安各姓聚族而居，绝无一杂姓渗入者，其风最为近古。出入齿让，姓各有宗祠统之，岁时伏腊，一姓村甲，千丁皆集，祭用朱文公家礼，彬彬合度”（赵吉士《寄园寄所寄》卷十二）。

“父老尝谓，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。千年之冢，不动一抔；千丁之家，未尝散处；千载之谱，丝毫不紊；主仆之严，虽数十世不改，而宵小不敢肆”（《新安旧志》）。

如此森严的宗法制度，无疑对徽州文化的传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自然环境和社会结构这两大因素，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地域文化的形式和发展。“古今沿革，有时代性；山川浑厚，有民族性”（《九十杂述》）。黄宾虹先生一语道破了个中三昧。

当然，作为一门兼济古今的“新学”，地域文化的研究不会仅限于对民俗风情的直观探讨，也不会停滞在对旧说的注释与阐述上。它将用科学的历史观剖析中国传统文化的组合

形式和流变方式，进而探索其深层结构。立足于这一文化视角，我们将从中国传统形式的“大一统”和观念的“大一统”的背景下，看到一组生机勃勃的文化景观。

“新学”的建立，还须要有新的研究方法相伴。在地域文化的构建中，似乎大有改变方法的必要。我们知道人与文化密不可分。但就演化方式而言，人类生灭有序，文化却变衍无常。我们以往许多文化学研究大概是受文化载体的生灭过程的影响，总是以时间为主线展开论说。这种方法便于一个学说的条理化，符合正常的思维方式，这些都是无可非议的。值得申明的是：这不是唯一的途径。以时间为主线的研究是一种线性的（或称“一维的”）研究，这不可能涵盖人类的全部文化。因为某一文化的形成、演变或进步过程，不完全是按照时间排序的，时间仅表现了文化的流变方式，却不能完整地反映文化的组合形式。应当看到：文化既赋予现实以意义，又需要现实的载承。而现实是一种动态的存在，是“变”与“不变”的复合体，“变”的表征是时间的流逝，“不变”的表征是空间的凝固。只有在这种时空构造中，文化才能够得到充分的认识。基于所谓“文化时空观”的臆想，我们不妨把文化作为环境的一个“人造部门”，在地理与文化相纽结的背景下，展开一种立体的（三维的）文化学研究。在这里，时间已成为“匆匆过客”，为一幕幕历史活剧提供变换的可能；空间却上升到了主导地位，成为文化存在的根据。只有按照这样的方法展开论说，我们才能认清文化全方位占有人类的事实。其实所谓方法的改变，只是时间与空间的错位，这种主次交换的最基本的心理依据是：地球是人类永难变换的载体，我们不能忽略它的存在和它的文化学意义。

显然，以空间为主线的研究具有非传统的特征，但它不

是反传统的，而是对传统的一种发掘和再认识。其实古代的学术思想流派常常有明显的地域性，《宋元学案》、《明儒学案》等著作甚至用地名标志学派。侯外庐先生明白地指出：

“各个学派的流传分布，往往也有其地域特点，大略的形势可以描述如下：儒墨以鲁国为中心，而儒家传播于晋、卫、齐；墨家则向楚、秦发展。道家起源于南方原不发达的楚、陈、宋。后来可能是随着陈国的一些逃亡贵族而流入齐国。楚人还保留着比较原始的‘巫鬼’宗教，同样在北方偏于保守的燕国和附近的齐国，方士也很盛行，后来阴阳家就在齐国发展起来。法家主要源于三晋。周、卫位于各国之间的交通孔道，是商业兴盛之区，先后产生了不少专作政治交易的纵横家”（《中国思想史纲》）。

这种带有地域特征的学派分析，使我们进一步感受到强烈的空间意识。

界说已划定，基础已奠立，然而这只是一个开端。当我们拂去岁月的风尘，步入中华文明的千年古殿，一种无名的压迫之感流变于心头：时间逝去了，历史活剧收场了，旷野也在不断地改变着模样。那高耸的山峰可曾记录着古战场铁马金戈的喧嚣？那残存的断壁是否映照看连云接日的霓裳舞姿？美里的著草、天坛的净土、东海的蜃景、西域的驼铃……这些浸润着一个偌大民族古老精神的自然景观，潜藏着哪些深不可测的文化内涵？时间逝而不返，它带走了壮景，淘尽了英雄，也湮灭了平民，留下的只有散在的文化遗迹和如峰

的盛典。在故纸的围迫之中，我们曾困惑，现在我们需要抖擞精神，为构建一个新的文化体系，再来一次艰难的起步。

快到世纪末了。

人类在本能的驱动下，开始了又一个百年周期的小结。

我们还在探讨文化！

.....

1991年4月

目
录

一、文明的曙光	1
二、吴王金戈越王剑	15
三、吴越文化的特征	30
四、水与吴越文化	49
五、市镇经济与资本主义萌芽	70
六、海禁与倭患	92
七、水乡风情	106
八、巧夺天工的民间工艺	138
九、吴越民俗	154
十、江南社会风尚的演变	178
十一、江南人文薈	202
十二、吴歌与越调	233
十三、文人墨迹	263

一、文明的曙光

(一) 句吴 于越 百越

句吴即吴，其祖先生活在今苏南、皖南、浙江北部一带，与于越在太湖东南一带错居，东临大海，西临彭蠡，北与楚接壤，南至新安口上游，北与南淮夷隔长江相邻。这片地区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吴地。于越的最早活动地区在今浙江北部以及太湖一带。

句吴与于越同属于古越族——“百越”，是“百越”的分支。百越是我国的一个古老民族，分布于我国的东南及南部，甚至越南北部的广大地区也有百越的足迹。“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，百越杂处，各有种姓”（《汉书·地理志》颜师古注引臣瓚），道出了百越所属地域之广，分支之多。“越有百种”（《吕氏春秋·恃君篇》高诱注），共中于越、句吴、扬越、闽越、南越、东越、山越、骆越、瓯越，都是越族中著名的分支。百越之名首见于吕不韦的《吕氏春秋·恃君》篇：“扬汉之南，百越之际，敝凯诸夫风余靡之地，缚娄、阳禺、